



翻译：卢彦名 胡浩 孙燕 王苗
审校：徐新

Saul Friedländer

索尔·弗里德兰德尔

灭绝的年代

THE YEARS
EXTERMINATION

纳粹德国与犹太人
1939-1945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中国青年出版社

灭绝的年代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1939-1945

纳粹德国与犹太人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著：【美】索尔·弗里德兰德尔

翻译：卢彦名 胡浩 孙燕 王苗

审校：徐新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灭绝的年代:纳粹德国与犹太人:1939~1945/[美]弗里德兰德著;卢彦名等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006-9768-8

I.①灭... II.①弗...②卢... III.①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犹太人-史料 IV.①K152②K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4803号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1939—1945

By Saul Friedlander

Copyright © 2007 by Saul Friedland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eorges Borchardt,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e copyright © 2009

By China Youth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9-4740号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 址:www.cyp.com.cn

编辑电话:(010) 57350508

责任编辑:李茹 Liruce@263.net

营 销: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

电 话:(010) 57350517 57350524

印 刷: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00×1000 1/16

印 张:35.5

插 页:2

字 数:598千字

版 次:2011年2月北京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9.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 57350526

致中国读者

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而言，本书讲述和解读的一系列事件也许并不十分熟悉。这些事件的极端性本质，以及在西方世界历史意识中成为极端恶象征的事实，引起了人们对这些具有极其深刻意义事件的关注。

由纳粹德国策划并实施、针对欧洲犹太人的系统灭绝行动，将受害者中的绝大多数从德占欧洲最边远角落遣送至为杀害他们而专门建造起来灭绝营的行动，是一项持续多年、日复一日不断实施的行动。极端的意识形态以及先进的技术使得这一残酷的屠杀行径得以在一个非常大的规模上展开。

尽管纳粹当局希望以最隐秘的方式实施其在欧洲的“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屠杀行径还是很快被人们察觉。最初以传闻的形式从东欧传到德国，最终传遍整个欧洲大陆。然而，对这一广为流传消息的反应不是漠不关心，就是无动于衷，甚至常常被策略性地欣然接受，当然在反犹主义盛行的国家还获得了明里暗里的支持。所有这一切导致了人们对纳粹时期与纳粹当局大范围的合作以及数量巨大民众漠不关心心态的总体关注。

在书中，本人一直试图用一种融合法讲述这一历史，即最大限度地利用留存下来的各种日记和信件，同时从迫害者的角度、周围社会的角度以及受害者的角度进行叙述。所有从不同角度审视的事件都是通过一连串极其短暂的时间单位来反映的。由于是通过个体的声音，特别是通过那些讲述自身当时的希望、幻想，理解的缺失、以及极度颓丧心情受害者的个体声音来讲述的，事件的讲述不可避免会出现停顿或中断。

灭绝的年代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1939—1945

本书讲述的一系列事件早已成为当代西方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过,其历史教训和具有的普世意义,应该对每一位读者,无论其身在地,都具有参照作用。若能够给他们以心灵上的触动,则是本人的最大希望。

索尔·弗里德兰德尔

2010年岁末于美国洛杉矶

中译本序

20 世纪对于犹太民族而言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世纪,特别是 1933 年以来,随着希特勒登上德国的政治舞台,一场以犹太民族为主要迫害对象的历史大屠杀便拉开了序幕,以纳粹德国为首的反犹主义罪恶势力把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推向极端。从 1933 年至 1945 年的 12 年间,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达 600 万,其中仅儿童就超过 100 万。被屠杀的犹太人数占当时全世界犹太人总人口的 1/3 以上。而在欧洲,平均每 7 个犹太人中就有 5 个遭杀害。

纳粹屠犹事件被认为是人类屠杀史上一个十分独特的事件,不同于历史上发生过的任何一场大屠杀。其特征主要在于它是一场当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掌握的国家机器,以及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一个生活在其中(和其外)的民族——犹太人——整体实施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迫害和屠杀。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经历过如此残暴的行径,没有任何民族经受过如此巨大的浩劫。

“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对纳粹的暴行进行了审判。纽伦堡国际法庭的判决书指出,按照德国保安总局犹太事务处头目艾希曼的统计,在被纳粹屠杀的 600 万犹太人中有 400 万是在专门的杀人点上被杀的。纳粹德国灭绝犹太人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纳粹屠犹这一暴行显然是 20 世纪犹太民族的悲剧,不仅改变了犹太人的历史,而且动摇了现代社会的基石。

为了真实记录和反映纳粹屠犹这一事件,在过去的几十年,无数历史学家和档案学家倾注了自己的心血收集了在数量上无与伦比的文献和证据,其中包括大量的原始日记、信件、声明、目击者证言和那个时代的其他文件资料。现有的文献

资料已经表明,历史上很少有比纳粹屠犹得到更周全记录的迫害、屠杀事件了。

如何记录和讲述这一历史?如何超越具体的历史事件,从全球与人类的视野来展示这场劫难?这显然是战后历史学家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和挑战。许多历史学家和学者在叙述大屠杀种种独特的历史事件中,尝试寻找适当的表述形式,纪实文学或传记的手法被大量运用来描述那些惨绝人寰的经过,同时把对犹太人的屠杀上升到人类生存困境的高度来认识。

在若干已经出版的记录和反映纳粹屠犹事件的重要著作中,这部由弗里德兰德撰写的《灭绝的年代:1939—1945》^①可以说是具有独特地位的。作者在书中大量使用了“原初叙事”资料,即大量来自原始日记、信件、声明、目击者证言和那个时代的其他文件的内容,并在写作过程中把历史学家的叙事与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叙事糅合在一起,从而实现了历史著作在记录历史时可能达到的高度和深度。

作为历史学家,弗里德兰德以十分严谨的态度撰写纳粹屠犹历史,可以说是用铁的事实记录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历史。

该书之所以呈现这一特点与作者本人的经历和历史观息息相关。索尔·弗里德兰德本人就是大屠杀的一名受害者和幸存者。他出生在布拉格一个说德语的犹太人家,童年随家人在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度过。1942年至1944年间隐瞒自己的犹太身份进入法国一所天主教寄宿学校上学,从而躲过了纳粹的迫害。然而,在法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加剧时,其父母试图逃往瑞士,遭到维希政府的逮捕,在交给德国占领当局后被遣送至奥斯威辛集中营,并在那里被毒气杀害。直至1946年,弗里德兰德才获悉父母遇害的消息。成长中的他开始意识自己犹太身份的意义,成为了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于1948年移居以色列。高中毕业后进入以色列国防军服役。从军队复员后进入大学学习,在50年代末当过以色列政治组织和人物的秘书或助手,其中包括当过现任以色列总统佩雷斯的助手。1963年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希伯来大学和特拉维夫大学任教。1988年以来成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作为纳粹屠犹的受害者和幸存者,弗里

① 本书是著名犹太历史学家索尔·弗里德兰德撰写的大屠杀史(总书名为《纳粹德国与犹太人》的第二卷,第一卷名为《迫害的年代,1933—1939》)。

德兰德尔决心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写作揭示纳粹屠犹历史。

弗里德兰德尔认为：“大屠杀的历史”不能仅限于对导致这一场最系统和最持久种族灭绝行动德国人的政策、决定和方法的叙述；它必须包括周边世界的反应和受害者的态度，因为从本质上说，我们所称的大屠杀事件是由这些不同因素聚合而成的总体性事件。此外，揭示和反映纳粹屠犹历史仅仅使用数字、抽象评判性的语言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在一点一滴中显现大屠杀，即在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一段又一段的记忆中去直面那段历史。大屠杀意味的不是受害者的数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的、有名有姓、有思想、有生活的人。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舒衡哲所言：“仅把大屠杀数字化和抽象化的所谓客观公正的政治与学术倾向则可能使大屠杀成为远离我们切身性的一种轻飘飘的存在。”因此，弗里德兰德尔记述的不但有发生的事情，更有“在场”的当事人对事情的直接描写记录，帮助读者了解受害者是怎样感受和理解发生在他们周围的事件的，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感同身受的历史，在读者的的心灵上造成持久的影响。

弗里德兰德尔的这一写法使得《灭绝的年代：1939—1945》“给人以‘你在那里’的印象，它将普通的男女老幼的哭喊与窃窃私语同希特勒及其党徒（再加上怀着卑鄙欲望和恶毒偏见和诸多帮凶）的狂虐施暴一并展现，从而见证了一幅千变万化的历史全景。通过目击者的生动回忆，这些故事共同织就了一幅生与死的画面”。（《华盛顿时报》的评论）

《犹太图书世界》发表的评论或许更加精辟地概括出了弗里德兰德尔的贡献和作品的特点：“这部作品将铸就他作为今日最具影响力和最敏锐的大屠杀写作历史学家的声誉。……通过遇难者的书信和日记，弗里德兰德尔赋予了遇难者的话语以生命。他或许比其他任何一位学者都更广泛和更熟练地使用了这些资料，这有助于他以小说家对悲剧人性方面的感觉来书写历史。弗里德兰德尔强烈地意识到，历史知识的作用在于化解怀疑和使历史变得通俗易懂，因此，在不消除或不压制任何一位读者都必须面对的长久的冲击感和怀疑感的情况下，他为我们提供了一部杰出的研究作品。”

鉴于当代国际政治的复杂多变，在过去的20年，世界上出现了一股不大不小否定大屠杀的逆流，有政治上的，也有学术上的，尽管这一逆流的矛头所向主

要是或为了否定现代以色列国出现的合法性,或是为希特勒招魂,但应该足以引起世人的警惕。因为否认纳粹屠犹不仅仅是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否认,而是对人类历史的否认,对人类生存尊严、人类正义和秩序的否认。如果让否认纳粹屠犹的现象大行其道,让否认的流言四处传播而不进行有力的抵制和制裁,那么未来世界里对一切历史的否认和歪曲都会变得微不足道,杀戮、暴行、诽谤将不再是禁忌,世界也将会变得更加堕落和疯狂,人类将无文明可言。因为历史上很少有比纳粹屠犹得到更周全记录的事件了。

为了坚定地抗击纳粹屠杀否定派,欧盟成员国在斯德哥尔摩国际论坛通过如下关于大屠杀的宣言:“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从本质上说是对文明基础的否定。大屠杀史无前例的特征使之永具全球意义。……由纳粹策划和执行的大屠杀的严重性必须铭刻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在人类社会仍然面临有计划的屠杀、种族灭绝、种族主义、反犹主义以及排外行径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必须承担与这些邪恶行径做斗争的神圣职责。我们必须一道坚持大屠杀这一铁定事实,反对否认大屠杀发生的各类分子。我们必须加强人民的道德义务以及各国政府的政治承诺,确保后代子孙能够理解大屠杀发生的原因和对大屠杀后果的反思。”

在纳粹屠犹过后 60 余年的今天,我们正处于过去的“现实”即将转化为“历史”的关键时刻,弗里德兰德尔的书以铁录的方式记载和记录着纳粹屠犹事件和历史,在对否定大屠杀逆流作出最好的回击的同时,无疑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值得阅读的关涉大屠杀的读本。

我们衷心希望通过对《灭绝的年代:1939—1945》一书的翻译和介绍,不仅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个反映纳粹屠犹事件的“鲜活”读本,而且为我们如何记录和反映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更希望中国历史学家以及有志致力于撰写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学者能够从本书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撰写出可以与之媲美的作品,为人们不忘南京大屠杀历史,牢记南京大屠杀历史作出贡献。

最后,还希望交代一下本书的译事过程。中国青年出版社购买了本书的中文版权,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承担了译事。尽管本人是本书翻译活动的组织

者,但具体翻译是犹太文化研究所的研究生们进行的。他们是:正在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卢彦名博士(序言、原书第 1~194 页,以及王苗翻译部分的初校),已经在河南大学执教的胡浩博士(原书第 195~356 页),在读博士生孙燕(原书第 356~520 页),以及硕士生王苗(原书第 520~663 页)。在读博士生葛淑珍协助对孙燕翻译的部分进行了初校。本人负责全书的校对和统稿。

由于本书篇幅大,所有参与者均是在学习、工作之余参与到这一翻译活动中来的,因此,译文的疏漏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徐新

庚寅年五月于金陵

致 谢

本书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1939年俱乐部”所提供的研究资金，尤其受惠于“约翰·D和凯瑟琳·T.麦克阿瑟基金会”。在此我谨向“1939年俱乐部”和麦克阿瑟基金会表达最诚挚的感谢。

首先，我想缅怀那些所有与我分享这段历史的许多有思想但已故的朋友：列昂·波利亚科夫、乌里尔·塔尔、阿莫斯·方肯斯坦和乔治·莫瑟。

本书定稿之前承蒙迈克尔·维尔德特教授（汉堡社会研究所）的指正，我非常感激他所作的评论。他与（慕尼黑）现代史研究所的迪特尔·波尔博士以及埃伯哈德·雅克尔教授（斯图加特大学）一起将我的注意力引导到最近德国学界的研究领域，帮助我避免了一些错误。同样，我还要感谢奥默尔·巴托夫教授（布朗大学）、丹·迪纳教授（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与莱比锡的西蒙杜布诺夫学会）和诺尔伯特·弗赖教授（耶拿大学）对本书各部分分别作出的评论。

尽管我经常陷入疑惑，但我还是在许多同行的反复鼓励之下完成了该项目，其中特别要感谢耶胡达·鲍尔教授、多夫·库尔卡教授、斯蒂夫·阿什海姆教授（以上三位均来自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舒拉米特·伏尔科夫教授（特拉维夫大学）和菲利普·布林教授（日内瓦国际研究学院主任），最后还有西比尔·米尔顿博士，一位杰出的学者和最无私的同行，他的离去是一个令人哀伤的损失。

当然，不言而喻，文中留存的错误（必定会有很多）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整个课题还有赖于一系列研究生的协助。在此我要感谢我最近的研究助理：狄波拉·布朗、阿米尔·科南和约舒亚·斯特恩费尔德。

在文稿勘印的过程中，哈珀科林斯出版社的苏珊·H.莱韦林和大卫·科拉尔运用了大量的语言学技巧。我非常感激他们，当然，最需要感谢的是我的责任编辑休·范·杜森，长期以来对我的关注和鼓励。助理编辑罗布·克劳福德一直以超

乎其职责的耐心应对着我的频繁要求。我还希望向我的朋友乔治、安妮和瓦勒里克·博尔哈德再次表达我衷心的感谢。我与乔治和安妮的个人关系和职业关系要回溯到 1966 年我第一本著作在美国出版的时候。

奥尔纳·科南的情感支持和智力支持对本书的贡献是我难以言表的；她分享了我的生活。谨以本书献给我新近出生的第四个孙子。

序 言

1942年9月18日,大卫·莫菲在阿姆斯特丹大学获得了医学学位。在一张当时拍摄的照片中,莫菲的导师C.U.阿里恩斯·卡珀斯教授和H.T.迪尔曼教授站在这位新医学硕士的右边,助理D.格拉纳特站在左边。另一位医学院教员,从背影看很像医学院院长,就站在一张大课桌的后面。还有一些人聚集在非常狭窄的门厅里,这些人无疑是家属或者好友,他们的面容在暗淡的背景下难以辨认。教员穿着他们的学位袍,而莫菲和格拉纳特则穿着打着白色领结的晚礼服。莫菲在他的短上衣左侧别有一个手掌心大小的大卫星犹太标志,上面印有“犹太人”字样。莫菲是德国人占领之下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最后一名犹太学生。

按照学术传统,一定会有惯例性的称赞和致谢。我们不知道是否还有别的评论。这之后不久莫菲就被送往奥斯威辛——比尔克瑙集中营。像荷兰20%的犹太人一样,莫菲幸存了下来。不过,根据同样的统计数据,在场的大部分犹太人不会幸免。

这张照片引发了一些问题。比如,当犹太学生已经在1942年9月8日被悉数开除出荷兰各大学的时候,这场典礼又是如何得以在1942年9月18日举行的?《摄影与大屠杀》的编辑找到了答案:1941—1942学年的最后一天是1942年9月18日的星期五,而1942—1943学年始于9月21日的星期一。在针对犹太学生的禁令成为强制性措施之前,莫菲还有三天的间歇可以接受学位。

实际上,这一间歇期刚好处在一个周末(9月18日星期五到9月21日星期一),这意味着校方同意了利用校历来对抗德国人的法令。这个决定显示出了1940年秋季以来荷兰各大学的普遍态度,这张照片记录下了在占领者的法律和法令边缘的一次抵抗行动。

还有更多的问题。荷兰对犹太人的遣送行动始于1942年7月14日。德国人

和当地警察几乎每天都在荷兰城市的大街小巷搜捕犹太人,以完成每周的定额。莫非不可能在没有特殊豁免证的情况下参加这次公开的学术典礼,德国人向这座城市的犹太委员会发放了1.7万张这样的特殊豁免证。因此,这张照片间接地触及了围绕犹太委员会领导层做法的争议,一些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得到(至少是暂时的)保护,而绝大多数犹太人的命运却被弃之不顾。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说,我们正在目击一场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典礼,这一点显而易见。在温馨的喜庆场景中,一位年轻人接受了赋予他行医资质的证书,从此他可以照顾病患,还可以尽可能地运用他的专业知识恢复病人的健康。但是,我们知道,别在莫非外套上的“犹太人”字样传达的是这样的信息:和他在整个欧洲大陆的“种族”同胞一样,这位新医学硕士被打上了屠杀的记号。

尽管看不太清楚,这个“犹太人”字样似乎并不是黑体字或者用其他常用字体写的。这几个字母是为这一特殊场合设计的(驱逐犹太人的各国都用类似的字体书写“Jude”、“Juif”、“Jood”),用的是一种弯弯曲曲的、令人不快的和隐约具有危险感的字体,为的是在容易辨认的同时使人联想起希伯来字母。正是通过这种字体及独特的设计,这张照片浓缩地展现出当时的形势:德国人正决意消灭作为个体的犹太人以及抹去大卫星和上面字母所代表的那个群体——“犹太民族”。

在这里,我们只感受到了对猛烈冲击的最微弱的回应。这种冲击旨在消除一切“犹太特征”的痕迹、一切“犹太精神”的印记,以及在政治、社会、文化和历史领域中的一切犹太存在(真实的和想象的)的留存。为此,纳粹在德国和整个欧洲被占领地区实际上动用了现有的各种消除和注销手段,在宣传、教育、研究、出版、电影、放逐、禁忌以及社会文化各领域发动反犹攻势,从修改被犹太性“玷污”的宗教文本或歌剧剧本到更改带有犹太人名街道的名称,从禁止由犹太艺术家或作家创作的音乐作品或文学作品的公演到拆毁纪念碑,从消除“犹太科学”到清洗图书馆(正如海因里希·海涅的著名格言所预言的那样),从焚烧书籍到焚烧人。

“大屠杀的历史”不能仅限于对导致这一场最系统和最持久种族灭绝行动的德国人的政策、决定和方法的叙述;它必须包括周边世界的反应(有时候是主

动行为)和受害者的态度,因为从本质上说,我们所称的大屠杀事件是由这些不同因素聚合而成的总体性事件。

这段历史在许多情况下被书写成了德国历史,这是情有可原的。德国人、他们的帮凶以及他们的仆从是迫害政策与灭绝政策的制定者、煽动者,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执行者。此外,随着第三帝国的战败,关于其政策和措施的德文文献变得触手可及。再加上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苏东阵营档案馆里保存的浩繁卷宗重见天日,自然进一步加强了这段历史编纂学界对德国方面的关注。在大多数历史学家的眼中,相比从遇难者和周边世界的角度来书写这段历史,则专注于德国层面似乎更加中规中矩和更加容易进行比较研究,换言之,更少“门户之见”。

这种以德国为中心的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当然无可厚非,但如前所说,大屠杀的历史需要一个宽泛得多的视野。在欧洲被占领地区,德国措施的执行在每一个阶段都要依靠政治当局的顺从、当地警察或其他力量的协助以及当地民众(主要是政治精英与思想精英)的消极服从或积极支持。此外,还要依赖受害者或者是为了缓解德国人的限制措施,或者是为了争取时间摆脱德国人的无情钳制而心甘情愿服从命令的意愿。因此,大屠杀的历史应当是一部综合完整的历史。

没有哪个单一的概念化框架可以涵盖这一段历史的多样性与综合性。即使是其德国维度也无法从单一的概念化角度加以阐释。历史学家面对着非常多样的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的互动,每一个因素都可以单独定义和解释,将它们聚合起来才能进行总体分析。在过去的60年中,有许多想法被提出,几年后又被抛弃,之后又被重新发现,如此往复,特别是关于纳粹的政策本身。“最后解决”的起源已经被归结为德国历史的一段“特殊的历程”,被打上了德国反犹主义、种族—生理学思想、官僚主义政治学、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现代性、“欧洲内战”(从左派和右派的立场看起来都是如此)之类的特殊烙印。

回顾这些概念需要看一看另一本书。在这篇序言中我基本上仅限于说明这里所要走的路径。不过,对于当前历史研究中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无论是涉及第三帝国的总体,还是涉及“最后解决”的个体,在此有必要作出一些评论。

第一种趋势是把灭绝犹太人看做德国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但这种研究着眼于新的视角:中间层面参与者的活动、有限区域内事件的详细分析、特定的制度和官僚机制分析——所有这些都为我们了解整个灭绝体系的运作提供了一些

新的启示。这种方法对我们的知识和理解都大有裨益：我已经把他们的许多发现整合进了我自己的更加着眼全球的探究之中。

另一种趋势与此不同。多年以来，这一思潮使许多新的轨迹得以发现。就大屠杀研究而言，每一道这样的轨迹都是从同一个起点分岔的：对欧洲犹太人的迫害和灭绝只不过是德国人主要政策的次级结果而已。这些政策目标中最经常被提及的包括通过杀戮多余的人口来保持欧洲被占领地区的经济均衡和人口均衡、通过种族重组和种族清洗来加强德国对东方占领地区的控制，以及通过系统地掠夺犹太人来减轻发动战争给德国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给希特勒的民族—种族国家）所造成的沉重负担。尽管这样的研究有时也能开阔我们的视野，但是它们的总体取向与我本人的阐释所隐含的核心假设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就像在《迫害的年代》中一样，我在本卷中选择了关注作为纳粹犹太政策主要动因的意识形态—文化因素的核心要素，这当然是根据具体情况、制度机制而定的，并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变化，尤其是在本书涉及的时段。

我们正在涉及的历史是“意识形态时代”的一个组成部分，更准确和更肯定地说，是这个时代的晚期阶段——欧洲大陆自由主义的危机时期的组成部分。从19世纪晚期到“二战”结束之前，自由社会受到了来自革命的社会主义左翼（在俄国成为布尔什维主义，在全世界成为共产主义）的攻击，在“一战”之后又受到了革命的右翼（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成为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成为纳粹主义）的攻击。在整个欧洲，犹太人被等同于自由主义者，并且经常被贴上社会主义的革命标签。在这种反自由主义与反社会主义（或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环境之下，那些披着各种外衣的革命右翼将犹太人视为他们与之战斗的世界观的代表，并将他们看做那些世界观的煽动者和传播者。

后来，在1918年战败之后民族仇恨高涨的气氛之下，由于全国（以及全世界）的经济动荡，这种主张在德国得以抬头。不过，如果没有希特勒痴迷反犹太主义和他的个人影响力，那些年里德国普遍存在的反犹主义或许不会在1933年1月之后，在国家的层面上，汇合为反犹的政治行动，也肯定不会造成后来的结局。

作为反犹主义意识形态来源，自由主义的危机和对共产主义的回应在德国被推向了极端，对整个欧洲的毒化也越来越严重。纳粹所传达的信号得到了许多欧洲人的积极响应，并且还在旧大陆以外赢得了为数众多的支持者。更有甚者，反自由主义与反共产主义还暗合了主流的基督教会所采取的立场，传统的基督

教反犹主义很容易与形形色色的专制政权、法西斯运动和纳粹主义同流合污并成为其意识形态原则的支持者。

最后，这一自由社会的危机及其意识形态基础造成了整个大陆上的犹太人越来越虚弱和孤立，尽管在同一片土地上，自由主义的进程曾使他们获得了解放并增强了他们的社会能力。因此，这里所描述的意识形态背景构成了这段历史的三个主要角色（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周边的欧洲世界以及分散于整个大陆的犹太社团）之间的间接联系。然而，尽管我扼要地提到了德国的嬗变，但是这些背景要素还不足以说明发生在德国那些事件的特定过程。

二

国家社会主义反犹过程的特别之处源于希特勒自身反犹主义的情结，源于希特勒与德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结合（主要是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以后），源于 1939 年以后纳粹政权反犹主义所导致的政治制度的工具化，源于 1939 年 9 月以后战争形势的发展。在《迫害的年代》中，我把希特勒式的反犹仇恨定义为“拯救反犹主义”。换句话说，这一反犹主义超越了与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直接的意识形态对峙，在纳粹领导人眼里，这两种意识形态都是犹太人为了自身利益创造出来的世界观。希特勒把自己的使命看成是一种以消灭犹太人的方式拯救世界的“十字军”运动。这位纳粹元首视犹太人为西方社会和历史中恶的源头。如果不进行一次必胜的拯救斗争，犹太人将会最终支配这个世界。这一在总体上属于后历史主义立场导致希特勒的政治意识形态愈加具体化。

按照希特勒的看法，在生物、政治和文化的层面上，犹太人企图通过散播种族污染、破坏国家结构，特别是制造 19、20 世纪主要意识形态灾祸的方式来瓦解各民族。而 19、20 世纪主要意识形态灾祸包括：布尔什维主义、富豪政治、民主政治、国际主义、和平主义以及各式各样的其他危险。通过使用五花八门的手段和手法，犹太人企图瓦解他们居住国的凝聚力——特别是日耳曼民族的凝聚力，从而篡夺世界统治权。自从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在德国建立以来，犹太人就察觉正在觉醒的第三帝国给他们带来的威胁，准备以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来摧毁阻碍他们实现最终目标的挑战。

反犹意识形态的不同内涵可以用一种最简洁的方式归纳和总结为：对于所有民族，尤其对于雅利安种族和日耳曼民族来说，犹太人都是一种致命而活跃的